

“农夫导演”把镜头对准爹娘的“爹娘”

从《俺爹俺娘》《乡村里的中国》到脱贫攻坚,纪录片导演焦波深情记录中国乡村与农民



智者 在民间。农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愚昧，他们在土地上的思考，跟我们在办公室里的思考不一样，但很生动、鲜活。我喜欢乡村，特别想给农民树碑立传，告诉大家，当代农民是什么样的

“也许多年以后我们再看焦波留下的这些光影，更能看出它的价值。那时，人们可能会说，幸好有焦波。”敬一丹说，她希望更多人加入焦波的行列。

事实上，受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等影片影响，已经有多支年轻的纪录片团队，开始学习焦波的拍摄模式，扎根乡村。而焦波这些年，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纪录片工作者。

“我的小伙伴们真是不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，有几个能像他们这样在农村一待一年？”焦波团队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85后、90后，其中不少都非影视专业出身，跟焦波本人一样，没上过什么正规的摄影课、纪录片课，而是带着热情，直接在实践中战场上，学会了拍摄。

《进城记》的主角之一覃猛，现在也加入焦波团队，成了一名成长迅速的摄影师。“我很幸运，脱贫攻坚，我先是受益者，又是记录者。”

亲身感受，又亲身拍摄了扶贫攻坚，让覃猛多了许多思考。“以出山进城来说，最幸运的是改变了命运的孩子，最无奈的是找不到工作的老人，最辛苦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。我希望政府能多帮扶更需要帮助的老人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，可以不要帮忙。”

他反感一些不了解农民的所谓专家对农民的评点，他认为他们团队的拍摄，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，更真实，也更有价值。“拍《老窝》时，我说过人们为国家上战场的时候，我还没出生，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，我参与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”

“他既是战果的享受者，又是战士。扛着行李出了山，又扛着机器进了山。”焦波说。他欣慰于年轻人的成长，“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干了，不知道他们会拍什么”。

自问种花人，何日赏花开

有人问焦波，都是退休年纪的人了，奖已经得了那么多，还过得这么累，图什么？

焦波承认年龄不饶人，自己体力下降明显，但他说，做喜欢的事不容易累，他“图的就是拍摄中的享受”。

“我说的是心里话，那种享受可太享受了。家里人说我，你多大岁数了，还这么拼？我说你真不知道拍到一场好戏、拍到一个好镜头的那种享受！你们谁也理解不了、享受不到，只有我体会到了，然后我再把它传达给观众。”

对于记录，他发自内心地喜欢，“平常人谁知道老窝山那种最边远、困难的地方，人们生活？谁知道他们怎么从那里搬迁到新村？只有我们，用摄影机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

这辈子想干的事基本都干了，而且还要继续干下去。“我想干什么，一定拼上全力去干，全身的血液都想贡献出去。”焦波说。

他想告诉年轻人，要趁年轻，把各种错都犯掉，想干什么赶快去做，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路，再锲而不舍走下去，这样的人生就多半能无憾了。

就像他选择拍摄乡村。“中国乡村比哪个（国家）范围都大，中国农民也比哪儿都多，我擅长这个，又喜欢这个，尤其别人不愿拍、觉得苦的地方，我就想去拍。虽然有时候也想尝试点别的题材，但每个人能干好属于自己的一件事情，就很好了。”

他笑着说自己还要再拍30年乡村，“就看我还有没有30年”。

前些年，焦波在老家包了1000亩荒山，在山上种松树、银杏、核桃、国槐等长得很慢的长寿树，他想把这片荒山绿化起来，当作一个从这片土地逃离的游子给故乡的回馈。

年纪越大，越惦记家乡。“等我跑不动的时候，要在老家做一个乡村电影节”。

“不过这一生，我拿不动机器的時候，可能也就完了，也许我会倒在田野里，真这样离开倒也很轻松。”饭桌上，这位总是充满热情的影像界老将，边拿起筷子夹菜，边随意地说。

去年元旦，焦波在遵义拍《进城记》的现场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想想这一生，信直不信歪，一条胡同走，碰头也自在……悬崖不勒马，苦尽甘自来。老来扎乡土，认劳不认衰，南山弄光影，北山收霞彩。一载又一载，载载无穷哉，自问种花人，何日赏花开？”

看到朋友们发来的各种慰问消息，他又在朋友圈里回复：“人生夜夜是良辰，抓住不放，很苦很累很享受。”

大图：《出山记》里的村子。

小图：在遵义拍摄《进城记》的焦波。

均由受访者供图

本报记者王京雪

焦波很焦急。这位今年64岁，被公认为最会拍农村、最会拍农民的纪录片导演，近五年来，总是忙着赶赴各种各样的“战场”，用镜头摄取一场大“战役”的片段。他觉得时不我待，岁不我与。稍微了解焦波的人都知道，他是用起时间来最“大手大脚”的那类创作者。他曾花30年拍摄《俺爹俺娘》，给自己父母留下12000多张照片和600多小时影像，他也曾用10年拍摄《川流不息》，记录几个汶川孤儿的震后青春。2012年2月初开始，56岁的焦波带着5个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人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小村子住了373天，拍出囊括华表奖、白玉兰奖、金鸡奖、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等20多个纪录片奖项的《乡村里的中国》，那是他首次以纪录片导演而非摄影师的身份，出现在公众面前。自那以后，焦波几乎从城市里“失踪”了。他的足迹嵌在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地许多个村子的土路上。一年五分之四的时间，他都不在北京的家里，对此，家人有点无奈：“习惯了”。

除了出山领个奖，参加几场活动，同行们也不容易逮到他。有时，他隔许久才在微信朋友圈冒个泡，说上来“透透风”，完了要“继续隐身忙活些事情，疏于联系，请朋友们谅解不怪”。

“就是想抓紧多拍，你稍微松懈一下，时间就过去了。”他要拍的可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“战役”——中国的脱贫攻坚战。

几年前，有影迷朋友转给焦波一个帖子，说到2020年，中国将有千万贫困人口走出大山，“哎哟，这是大迁徙啊！历史上那些大搬迁我都没经历过，这次我一定要拍。我对记录时代性的大事件一直感兴趣，在大事件里，会发生很多故事。”焦波说。

赶巧，贵州省遵义市委宣传部部长看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后，深受感动，辗转联系上焦波，邀他到遵义拍摄脱贫攻坚进程，焦波很快答应，并提出要去极贫乡镇，拍最艰苦的地方。就此，他在拍摄脱贫攻坚战的路上一发不可收。

有人质疑焦波是拿纪录片给政府唱赞歌。“我说这种态度不对，这么大的事，这样的战役不去拍，作为纪录片人就太失职了”，这句话促使焦波借钱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。

2020年末，脱贫攻坚战战的收官之际，焦波在朋友圈回顾5年来的拍摄，与

脱贫攻坚战直接相关的纪录电影有9部：《出山记》《进城记》《种瓜记》《淘宝村》《大众村》《油桃妹》《老窝》《大歌》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。“纪录电影助力脱贫攻坚，我们参与了，我们经历了，我们收获了，我们无悔了。”

11月23日，贵州省宣布剩余的最后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。至此，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。

同一时刻，焦波的团队窝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老窝村，忙着给纪录片《老窝》收尾。

从拍摄爹娘，到拍摄爹娘的“爹娘”

不知何时起，焦波有了“农夫导演”的称号。

一方面，是因为他的镜头始终对着乡土中国，对着农民的故事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，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他还会说自己农民，“而且我越来越这么觉得”。

他挺喜欢这个称呼，说是“雅号”“桂冠”，要永远珍惜，要坚持在泥土里种植故事——不管拍哪部片子，焦波团队都有人至少要在当地拍上一年，就像农民在泥土里种植庄稼一样。

焦波自己也是泥土里长出来的。他出生于山东淄博一个叫“天津湾”的村子。父亲是村里的木匠，读过4年私塾，《论语》倒背如流，会跟儿子讲生活中的道理，比如，“锯要一锯一锯拉”，拉大锯很容易，但学术匠却要先拉3年大锯，为的是用3年磨踏实性子。又如，“水多泡倒墙”，这是水滴石穿的通俗说法。

母亲个子只有1米41，裹着小脚，却能一个人推着家里两三个孩子合力才推得动的石磨，天不亮就磨完煎饼面，好让孩子们多睡会儿觉。焦波问母亲，你一个人是怎么推完的？推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母亲说什么也没想，就是抱着磨棍使劲往前走，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。

“智者 在民间。农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愚昧，他们在土地上的思考，跟我们在办公室里的思考不一样，但很生动、鲜活。我喜欢乡村，特别想给农民树碑立传，告诉大家，当代农民是什么样的。”焦波说，“我觉得中国农民身上的一些精神，恰好是时代需要的。”

报道刊发后，在各方帮助下，村里终于打了水井，焦波又去拍村民们咕咚咕咚喝水，围着水井笑逐颜开的画面，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颤巍巍走过来跟他道谢，说：“焦记者，等你退休了，我们养活你。”

“她80多岁，我30多岁，谁养活谁啊？可话里那种淳朴、那种心意……她说的不是‘你好，谢谢你’，她说的是‘我们养活你’，说起这个，我就想掉泪。”焦波说，“我就是这样，对土地，对乡村，对老百姓的感情越来越厚。”

后来，焦波调到北京，进了人民日报

社。有了更高的舞台，他的创作视野却依旧向下沉淀，从胡同里的“民间外交家”到北京最后一代掏粪工人，他拍摄大量百姓故事，同时，也继续拍着《俺爹俺娘》。

“最初就是很狭小的念头，多拍照，用照相机把一天天老去的爹娘留住，没想过得奖，没想过出名，没想到这组片子最后成就了我。”这组照片为他带来国内外的各种奖项和关注。

多年后，爹娘走了，焦波开始拍摄爹娘的“爹娘”——中国乡村。

2012年，他接到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“命题作文”。有感于农耕文化所受冲击和乡村的消失，张宏森希望有人能扎扎实实去农村住一年，拍一部能进院线的农村纪录电影，这就是后来的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。

考虑到成本、操作难度和商业价值，焦波接手前，这个项目被搁置数年，还被断言不可能完成。“我们想到焦波，觉得只有他能做这件事。”制片人高峰说，尽管焦波当时还是个没什么拍纪录片经验

的图片摄影师。从故乡的村子拍起，焦波拍的村庄越来越多，他发现，“爹娘会拍完，但爹娘的‘爹娘’永远拍不完，乡村是我们每个人的爹娘，是中华民族的根。”

在村子里，他总能拍到编剧们想象不到的“剧情”，拍到老戏骨演不出来的人物，拍到人们不曾听闻却直击人心的话语。

作家程绍武觉得，焦波作品中贯彻始终的人民性让人联想到杜甫，“从杜甫的诗中，我们能看到社会的变迁、人民的疾苦，所以称他的诗为‘诗史’，而焦波就像影像界的杜甫。”

出山不易，进城更难

“我不满意！你们每个人的水平我都知道，我一直说脱贫攻坚到了最艰巨的时候，我们片子也到了最艰巨的时候，人生能有几回搏？我们有幸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，要参与，要像董存瑞炸碉堡、黄继光堵枪眼那样！”

这是拍《老窝》中途，焦波跟几个团队成员总结工作进展时说的话，听上去像战时动员，他也确实把拍摄脱贫攻坚视为一场硬仗。

傩傩族村庄老窝村，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老家山上，交通极其闭塞，雨季泥石流频发。这是个“直过民族”村落，就是新中国成立后，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村落，这里的村民仍保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古朴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。

2019年秋，摄制组进村拍摄。今年夏天，村民集体搬迁到老窝新村，老窝村就此成为中国最后消失的几个传统村落之一。

焦波进老窝，是连滚带爬地进去的。同行年轻人拍下了他进山步行两小时

后，扶着木杖驻足，顶着被汗水打透的湿发，拼命大口喘气的画面。那时，他的间质性肺炎好转没多久，在海拔地区，胸部总觉得闷。碰上泥石流，大块石头哗啦啦滚下来，他和队伍里的80后、90后伙伴们互相呼喊对方快走、快走，他隐隐担心过自己会“命丧老窝山”。

进村后，焦波每晚看素材、梳理故事线，常看到凌晨一两点，早上六七点钟起床，继续战斗，每天都在倒计时，“村子马上就要拆了，我必须尽快确认还缺什么内容没拍，在它彻底消失前去拍回来。”

与此同时，焦波团队另一支几人的小队，正在贵州一个侗族大歌传承地，拍摄村里如何传承大歌，如何发展乡村旅游，助力乡村振兴。“脱贫攻坚5年时间，我想尽量多拍几个不同地方，看看不同民族、不同生活方式、不同条件下的村子不同的脱贫攻坚过程。”焦波说。

他拍摄山东菏泽的“淘宝村”丁楼村，看一个曾经的贫困村里，一群普通农民怎么在互联网浪潮中乘风破浪。“淘宝村”是指中国特有的网商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%以上，且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。

他拍摄江苏宿迁的大众村，同样走上发展电子商务的道路，大众村过去污染严重，几乎全村都在做废旧塑料加工储运的生意。

在贵州遵义，他拍下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村民走出大山的过程，叫《出山记》，又拍下遵义新区新中街道幸福社区里，一群通过易地搬迁进城的农民如何慢慢融入城市的过程，叫《进城记》。

出山不易，进城更难。焦波并不回避过程中的冲突，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们在他的镜头下，毫不避讳地说笑、哭泣、吵架甚至动手。

焦波说，拍脱贫攻坚，虽然没有硝烟战场上的故事那般跌宕起伏，却让他体会到了人们心灵战场中生发出的百般滋味。

“不回避贫穷，不忌讳矛盾，因为这就是一场战斗。你不穷，怎么叫扶贫？不难，怎么叫攻坚？出现一些问题，有老百姓一时想不过来，都很正常，有问题就解决问题，哪有什么事能没有问题呢？”焦波说。

有人评价，焦波的纪录片像面镜子，将脱贫攻坚、精准扶贫、发展产业、易地搬迁等抽象名词统统具象化，把观众带到一线，亲眼看数字和名词背后活生生的人跟他们的生活。

在《老窝》里，中学生邓志华想退学打工，说：“老天爷怎么会安排我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，为什么没让我在外面出生？”

在《出山记》里，农民申学王的父亲进城后逛超市，看不懂价格标签，把2元当成20元，当他和妻子讨论想在楼顶上养鸡，当老房子被拆掉，有村民抹着泪说他知道这是好事，但修这个房子不容易，当村支书申修军挨家挨户做搬迁动员，挨骂甚至挨打，回家后被妻子埋怨，亲弟弟又因为他是村支书，被村里人“盯”上，符合条件却没能享受到扶贫优惠政策，跟他大吵一架……

在《进城记》里，青年覃猛在夜里骑着电动车，张开双臂唱歌，他也会说：“政府给我的不仅是一套城里的房子，更是一个平台……我不后悔出生在这种家庭，我相信我可以改变以后的命运。我就是不甘平凡，我告诉自己，覃猛，你要么是神话，要么是个笑话。”

拉扯大8岁儿子，照顾70多岁老父亲的杨多曼因为视力问题在城里被老板